

第一集

张明高 范桥 编
• 周作人 著

周作人散文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名著文库



周作人散文

(第一集)

张明高 范 桥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周作人散文

(一)

张明高 范 桥编

沈楚瑾 责任编辑

李 萌 封面设计

张智勇 版式设计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23 印张 515(千)字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100 册 定价:12.50 元

ISBN 7-5043-1387-4/I·122

(京)新登字 097 号

编者前言

周作人(1885—1967)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他一生著作宏丰,有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近年来对他的研究日见重视,这是应该的。他的著作也已出得不少,虽然还不完备,我们着重从他的最主要创作成果散文中选取这一套选集,给一般读者也给研究者提供一些方便,也许不是无益的。下面我们谈一谈对编选周作人选集以及对周作人其人的一些感想。

一

大家知道,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只比鲁迅小三岁,二人有大体相同的经历,并且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学习和互相帮助,一起为新文学的创立和发展努力,仅就散文这一门类他们所达到的成就来说,可以说是双峰并峙,而又二水分流,同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丰碑。但是,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是无产阶级的不朽战士,而周作人的结果却极不相同,不顾民族气节,曾经堕落成为汉奸,担任过六年伪职,这不仅是他个人一生的奇耻大辱,也使中国文化和文学蒙受了重大损失。周作人的堕落使人困惑,也使研究者为难,简单否定周作人不合

适，过于肯定他也不合适，至今还在困扰着人。不过，辩证法教导我们，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历史地看问题，再复杂的问题也总能求得一个相对合理的解决。

周作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出身士大夫之家、书香门第，先受传统的诗书科举教育，少年投身洋务入江南水师学堂，学到初级科学知识和英文，青年时官费留学日本学习土木工程，其实学的是日文和古希腊文。这一个成长期，周作人的爱好杂览比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对于生活现象有浓厚的兴趣，民风民俗和人民实际生活颇为引起他的兴趣，少年时的日记就喜欢记载琐碎的衣食住行等等物事。他读书可说是贪多务得，如饥如渴，当时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谭嗣同的《仁学》等新思想的文章，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民约论》、《原富》、《穆勒名学》都给了他以振聋发聩的启蒙教育作用，日记中记载了他当时欣喜若狂的心情，这是他接触西方新思想的开始。他和其他青年爱国者一样，当时也是想富国强兵，相信强权的。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说部小说，这和他对于生活问题的关心是一致的。同时周作人发现了希腊，由《天方夜谈》知道了水手辛八、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在水师学堂结业之前，已经从英文翻译或改写了《侠女奴》和《玉虫缘》，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后来翻译成为他的终身事业不是偶然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他青年时期即开始读佛书，由是出现了悲天悯人的思想，佛家的相对观念对他后来的信念影响不可轻视，不过在此时只是昙花一现，瞬间即逝。

在日本，周作人留学六年，所受影响最为深远。日本当时正是明治维新时期，接受西方新思想比中国多而快，周作人既学日本文学前辈的东西，也从日本购读西方的书籍，和鲁迅共同从事文学活动。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说文》，也接触到了印度学问。说

日本对周作人的影响深远，既有思想上的，也有生活上的，娶了日本妻子，又爱好日本简单质朴的生活方式和民风。周作人的“日本通”就是这时期打下的基础。后来在抗战时期周作人丧失气节的行为，正是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栽了跟头。而且，当时是革命时期，周作人固然同情革命，而本人并未成为革命党，有某种游离或者距离，这是事实。他的兴趣是研究文学和文化，中国的、日本的和西方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和当时日本和西方的新思潮是保持了同步的，这和后来“五四”时期的焕发有直接关系。在日本，周作人与鲁迅一起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当时的着眼点是匈牙利、俄国、波兰等被奴役和正在受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反映了他们对祖国命运的共同关心。

辛亥革命时，周作人回到了故乡绍兴。一面教书，一面继续研究日本和西方文化，乡土文化和乡贤文人前辈的著作更是他耽读的重点，徐渭、陶奭龄、王思任、张岱、毛奇龄、章学诚、范寅、俞樾，直到李慈铭，都是他爱好的对象，虽然喜爱的程度各有不同。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周作人中西学问的根底已经相当深厚了。民国六年（1917）周作人到了北京大学，适逢其会，得时则驾，投身到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参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核心的《新青年》和稍后的《每周评论》的工作，在文学革命运动中也发表了他自己的许多重要文章，如《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个性的文学》、《美文》和《思想革命》、《祖先崇拜》等，正式地表达了他以人道为核心的文学观，阐明了在文学革命之后必须有思想革命的深化，清算旧文学、旧道德、旧思想，用科学、民主、自由的新思想来重造国民性，反映了他当时改革的热情和希望以及见识的深刻。此一时期，周作人的社会声望是很高的，当时建立的最大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宣言就是由周作人起草的。他

当时以文学作为“自己的园地”，辛勤耕耘。《语丝》杂志的出版发行，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周作人说这个杂志是“我们这些不伦不类的人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的园地，林语堂赞扬《语丝》的文风是“稳健、骂人、费厄泼赖”，简单地说的不拘形式、不拘风格的小品文园地。当然，《语丝》始终是在鲁迅的关怀和支持之下的一个刊物，但也不可否认，《语丝》前期的主要编者是周作人。他既创作，又翻译，日本狂言、希腊小诗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和“正人君子”陈源及“老虎总长”章士钊的斗争、对日本人的文化侵略的揭露、对国民党集团发动的反共反革命的“清党”也有许多消息是在此处披露。这一个时期正如周作人自己曾经说过的他写作的中心是“时事和文章”，既谈时事，又谈文学和文章。在这里表露了他的思想光辉和智慧，是他一生最有社会价值的时期。

周作人由于一系列社会事变，“三一八”事件、张勋复辟、孙传芳的读经、张大帅的杀害李大钊，特别是蒋介石的“清党”，对周作人原来的社会改革热情起到了摧毁的作用，1928年发表《闭户读书论》，继“文学店关门”之后又宣布“杂文店关门”，于是“看云”“永日”，研究者说当起十年的“隐士”，准确说是他落伍和消沉的时期。而这对他后来的变化是非常致命的。他开始写作草木虫鱼系列文章，博物和民俗并谈，古书越读越多，“浮躁凌厉”之气消失，怀疑失望之感日重。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他感到祖国“风雨如晦”，已经到了明季，是一片亡国之象了。他很关注明末清初那些遗民的著作，早有了亡国之后作遗民的思想准备。不过文学店并未关门，对新文学古文学关系有精深的研究，对“公安派”文学作了不少阐发。对蒋介石的反动“清党”产生了深深的疑惧，回头去看太平军的历史，对革命在中国的效果产

生了怀疑，大概觉得未必是好事，他闭户读书的结果是形成了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混世哲学，无可无不可，身家性命第一，对国家绝望。他反对道学的旧道德、旧思想不幸在此时得到了最不好的结果，正好是在道学家强调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问题上跌倒了。这里有一些教训可以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和文人心态不是没有意义的事。

北京沦陷之时，周作人在当时不是一个各方面已经遗忘了的过时人物。朋友和“敌人”都在关注着他。对于他与日寇的暧昧关系，左派文化人声明斥责，右派朋友如胡适也写诗劝说他离开北京，当时也算文化界的一个大事。周作人一意孤行，要在北京“苦住”，还有种种借口，说是有“家累”，说他十口之家不好轻易抛下不管，还要照顾母亲和鲁迅的孀妻朱夫人，又说有海派和京派之争，到南方左派也要杀他云云。他似乎有一种忍辱负重的“理论”，在《苦竹杂记·〈天醉随笔〉》中有一段文字说：“《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答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此语极精。《颜氏学记》中亦有相似的话，却没有说得这样彻透。近来常听有人提倡文天祥陆秀夫的一死，叫大家要学他，这看值得天醉居士的一棒喝。”所以他后来担任伪职说是“老而为吏”而不以为耻；又诋毁岳飞等抗金将领，反说秦桧的求和保存半壁江山倒是有见识，还引朱子的话为证。有的研究者说周作人心里有一个明末的钱谦益做榜样，这当然有些道理。但是，更广泛一点看，周作人似乎更接近六朝人的人品，那时的文人如徐陵、庾信、颜之推、周弘正、王褒等等，都是在南朝灭亡之后或者先行入北朝做官的，那时也是民族不同的政权，中国多的是这一类国破家亡的事实，文人投靠新朝

做官不乏其人。当时几个青年人的刺杀，他侄儿的愤而自杀，都没有能阻止周作人与敌人同流合污。一句话，周作人就是为了保全性命，他后来引用倪元镇受辱于张士信的话是说“一说便俗”，基本上至终采取不辩解主义，听凭他人说是非。平心而论，相比而言，他没有王衍入洛认贼作父的卑鄙，也没有钱谦益身为福王朝廷的重臣而率先迎降的恶劣。他也不曾真正为日寇卖命，从清末的光绪朝、到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他并不拥护任何中国政权，以前他还大量批判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43年他发表了《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说中国有自己的中心思想，生存受到威胁，也会反抗，这引起日本文人片冈铁兵的指责，称呼他为反动老作家。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北京，逮捕了周作人。在以汉奸罪审判周作人的过程中，当时北平十五教授联名致信国民党当局，请求量刑从轻，最终判处十年徒刑，投入南京老虎桥监狱。周作人在日本投降前，表示了“知惭愧”，但是他的政治生命其实是结束了，然而文字生涯远未结束。1946年初，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一文中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的附逆。……他确在新文学上尽了很大的力量。虽然他后来已经显得落伍了，但他始终是代表着中国文坛上的另一派。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就要黯然失色。”并且提出了保全他让他发挥翻译上的特长再做些工作。直到去年，巴金先生还谈到：“周作人的文章写得好。抗战时，有人劝他离开北京，他认为有京派海派之争。他说他要留在北京，到了上海左派也会杀他。他主要认为日本人对不会怎么样，结果一步一步当了汉奸。”“周作人如果

离开北京，可能就不至于做汉奸。”又说：“我觉得人归人，文章还是好文章。”（转引自李辉《与巴金谈沈从文》，《随笔》1990年第5期。）周作人在国民党法庭上的一个辩护观点是说他在日伪时期不曾宣传过奴化，周作人自己已经收集的文章倒是容易找奴化的证据，而在当时应景的政治性表态讲话中有一些附和日寇汪伪的言论。这些话与他以前判若两人，难以相信都是真心话。大概与汉朝扬雄写《剧秦美新》讨好王莽差不多，也是文人无行的一种表现。有意思的是1945年2月他给人题写小联，集陆游的诗句“多难只成双鬓改，浮名不值一钱看”（转引自《周作人年谱》），恐怕不是无意的。总之，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和他自己的谬误的结果，为此他要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在国民党监狱中周作人并未停止读书和写作，他继续翻译希腊文学，读了几种《说文》著作，写了几百首诗歌，好象还是存在着某种精神力量，至少是不忘本业，读书和文章是他的生命，是他存在的人生价值。用他的话说监禁了一千一百日，国民党在行将崩溃之时取保释放了周作人，在上海他迎接了新中国的到来。他获得了新生，也表露出一定的热情，从1949年到1952年他在上海《亦报》和《大报》上发表了九百多篇小品随笔文章。以后在海内外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在国内的文章都不用本名，他说到自己已经没有了写文章的资本。1949年秋天回到他在北京的家，受到文化界的关怀，被安排主要从事希腊和日本古典文学的翻译，发挥他的专长和余热，也在生活上有了一定的保证。在十多年中，在翻译之外，周作人结集了三种关于鲁迅的回忆录和小说研究集，特别是晚年写出了《知堂回想录》，用他亲身经历的史料写出了几个时期文化界的许多珍贵历史事实，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由此可见，宽大些宽容些对周作人这样

的人会有好处，也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气魄和甄别能力，是辩证法的一个好例。不过，本来平静的周作人晚年生活，最终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打破，红卫兵冲击了他，受到了折磨而在1967年5月悄然离世，结束了他“多寿多辱”的一生。总体说，周作人是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悲剧型人物，他一生的荣辱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多灾多难。

二

周作人一生的文章是他的思想和才情的体现，也是他的人格的表露，尽管他在大节上有污点。周作人一生在文章之外，也还做过一些好事，他曾经同情受难的共产党，保护过李大钊的遗属。至于周作人的文章，1927年以前的历来有好评，抗战时期的意义较小，但也不是毫无意义。周作人一向称自己是“言志派”，这个“志”是内容相当广泛的，自有其特色。下面结合思想来谈他的文章。

人道主义的文学观，个性的文学观。这两个中心观点早在“五四”前他就提出并加以阐明。他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当然这些思想是从西方来的，但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新鲜事物。对于人道主义文学他具体说到西方十五世纪发现了人，这当然是指文艺复兴而言。他又谈到了“女人与小儿的发现，却迟至十九世纪”，“到了现在，造成儿童学与女子问题这两个大研究，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来”。这些主张，在那时是针对“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传统观点的，科举考试的四书文过去不久，桐城派统治文坛，《新青年》上猛烈攻击“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新旧

文学主张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周作人攻击载道派一直上推到韩愈，这正是姚鼐推崇的桐城派文章的祖师，在周作人看来，韩文一无可取。载道派就是代别人即圣贤讲话，灭没了个性和自己，现在人民站立起来，说自己的话，讲自己的思想和情志，这是新的民主自由时代精神的呼声。进一步周作人提出了平民文学主张，这是配合陈独秀反对贵族和山林文学的理论。周作人自始至终强调个性的文学，他说：“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是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其余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这在当时文艺思想上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后来深入一层的研究，他断定新文学的中国思想来源是在明末形成的：“虽然已是三百年前，其思想精神却是新的，这就是李卓吾的一点非圣无法气之留遗，说得简单一点，不承认权威，疾虚妄，重情理，这也就是现代精神，现代新文学如无此精神也是不能生长。”（《关于近代散文》）他对文学革命的概念作了修正，认为是上接“公安派”的文艺复兴。这种说法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在以前也反复说过多次。但有一点却是正确的，即强调思想的解放，如他说“我看明末清初算是近世的思想解放时代”（《瓜豆集·〈常谈丛录〉之二》），没有思想的解放也就没有文学革命了。周作人痛恨八股文，不单指老八股的时文即四书文，后来出现的一切八股他都不喜欢，他说：“今人（指吴稚晖）有言，土八股之外加以洋八股，又加以党八股，此亦可谓知言也。关于现今的八股文章兹且不谈，但请读者注意便知，试听每天所发表的文字谈话有多少不是无意义，不是讲体面话者乎？”（《夜读抄·〈颜氏学记〉》）他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带有明显的民主启蒙的色彩，又有一段话虽然是谈对于性的问题的，但是有更广泛的意义：“中国人落在礼

教与迷信的两重网里，(虽然讲到底这二者都出萨满教，其实还是一个)，永久跳不出来，如不赶紧加入科学的光与艺术的香去救治一下，极少解脱的希望。”(《谈龙集·〈香园〉》)在那个时候，他把八股、鸦片、缠足和太监视为中国四害，说过：“厥疾不瘳，国命将亡”。(《颜氏学记》)他后来在《过去的工作》一文中说到：“最初的主张未必真是简单的文学救国，总之是相信文学之力，以为要革命或改造可以文学运动为基本，从清末起以至《民报》及《新青年》上写文字始终是这样，这或者不算怎么错，但是后来也有转变了。”其后就多谈思想和道德问题，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伦理自然化和道义事功化这种观点。

生活文化的文学观，这是周作人的独特之处。他在抗战时期结集出版的《书房一角》序中说到：“不佞读书甚杂，大抵以知道平凡的人道为中心……我喜欢知道动物生活，两性关系，原始文明，道德变迁这些闲事……有点功夫便来拉扯的说一点，关于我所感觉兴趣的学问方面都稍说及。”他认为，人性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他对于人类生活与人类文明是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的，他说过：“文明是什么？我不晓得，因为我不曾研究过这个东西。但文明的世界是怎样，我却有一种界说，虽然也只是我个人的幻觉：我想这是这样一个境地，在那里人生之不必要的牺牲与冲突尽可能地减少下去。我们的野蛮的祖先以及野蛮的党兄弟之所以为野蛮，即在于他们之多有不必要的牺牲与冲突。”(《谈虎集·抱犊谷通信》)在他的理想人生梦中，有一种回头看的乌托邦倾向，曾经提出过恢复旧文明：“中国现在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雨天的书·生活的艺术》)。他认为这种唐以前的中国旧文明和古希

腊文明是健康的、正常的、自然的、合乎人性的。他又说过“因为仙人掌似的外粗厉而内腴润的生活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玩具》)他把这种观念称做“生活的艺术”。那么反映在文学和文章中,他要求的是:“思想博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虫鱼之微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谈笔记》)或者说:“这是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合成功的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杂拌儿之二》序)于是在周作人的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写的人世事情,也就是林语堂说到的“苍蝇之微,宇宙之大”无所不谈了。不过周作人不太谈宇宙,认为宇宙抽象空洞虽然可以随意谈、容易谈,但不切合人生,他是唯物的,谈人生琐屑之事,认为人生琐屑之事构成人生的宇宙,曾引用前人的话说“人生不过饮食男女”。所以当时有批评家说他们“只见苍蝇,不见宇宙”,他也不管,我行我素。他说过:“乃知天下事无不可书,只要见兴趣味文字三者足以胜之。”(《书房一角·〈扬州画舫录〉》)平心而论,周作人的文章确实描画出了他所见到的现实生活和整个世界,古今中外,范围之广大,见解之通达,读之不免使人惊异,甚至叹赏,说是气象万千并不为过。

两个鬼的文章,中庸的叛逆精神。1926年他就写过一篇《两个鬼》的文章,说在他身上存在着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流氓鬼反叛,绅士鬼调和。到了1945年又写了《两个鬼的文章》对于自己在文学活动中的思想事实上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说道:“我的确写了些闲适的小文,但同时也写正经文章,而这些正经文章里面更多的含有我的意思和意见,在自己更觉得有意义。我写闲适文章,确是喝茶喝酒似的,正经文章则仿佛

是馒头或大米饭。在好些年前我做了一篇小文，说我的心中有两个鬼，……也可以说叛徒和隐士……我从民国八年在《每周评论》上写《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两篇文章以来，意见一直没有怎么改变，所主张的是革除三纲主义的伦理以及附属的旧礼教旧气节旧风化等等……但是杂文店的名誉虽好，……久了也会厌足，……有时想写点闲适的所谓小品，聊以消遣，这便是绅士鬼出头来的时候了。”文中所说的“杂文店”就是指他那些面对现实与旧思想旧道德短兵相接的文章。他一直是异端自居的，说：“但我的偏见以为思想上文艺上的旁门往往要比正统更有意思，因为更有勇气与生命。”（《梅花草堂笔谈》等）因此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三个思想家值得称道，一个是东汉的王充，一个是明朝的李贽，还有一个是清朝的俞正燮。文学家中也只喜欢陶渊明和颜之推，都是六朝人。他认为“许多传世名文在我看去都不过是烂调时髦话，而有些被称为平庸或浅薄的实在倒有可取，因为他有思想，也能说得好”（《春在堂杂文》）。并说他自己：“我也喜欢弄一点过激的思想，拨草寻蛇地去向道学家寻事，但是如法国拉勃来（Rabelais）那样只到‘要被火烤了为止’，未必有殉道的决心。”（《雨天的书·与友人论性道德书》）这种中庸思想贯穿周作人的一生，并没有多少改变，其实是他一种自信的思想表现。他有一个自信的说法：“我自己相信，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重的贡献。”（《两个鬼的文章》）他所攻击的道德思想的目标“总拢来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与科举制度的流毒”。他最终只能停留在民主启蒙的水平上，不能更进一步了，但其意义也不可忽视。

小品文的大师，杰出的散文作家，是他文学上的最主要贡献。胡适在1922年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说：“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象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这是肯定周作人在发展小品散文上的贡献，确凿不移。1921年周作人发表的《美文》一篇小论文，说：“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但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周作人这里所说的就是英文里的 Essay，现在通译随笔，或小品文、絮语散文、随笔散文等。周作人在这一方面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小品文也是他自己找到的最佳文学表现形式。他对于小品文的品格推崇甚高，如说：“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看云集·〈冰雪小品选〉序》）又说：“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文学大盛，统是平伯所谓‘大的高的正的’，可是又就‘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

的东西。一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这自然因为我们是诗言志派的。”五四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崩溃，政治混乱不统一的“王纲解纽”的时代，那时有相当的言论自由，各种新思想都有表达的机会，作为时代晴雨表的文学当然走在前面，不拘一格的小品文之受到重视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虽然周作人提倡写作英国式的小品文，但是他又强调受到的外国影响最小，说过：“我常这样想，现代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陶庵梦忆》序）这种说法不为当时多数文学作者所接受，如郁达夫就直接说是翻译过来的。但周作人有他自己的特殊理解，似乎并非全无道理，他强调的是中国气派，在《〈杂拌儿〉跋》一文中说：“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又：“正宗派论文高则秦汉，低则唐宋，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门外道的眼光来看，倒还是上有六朝下有明朝吧。……因为公安竟陵一路的文是新文学的文章，现今的新散文实在还沿着这个统系。”（《近代散文抄》新序）因为公安派的袁宏道主张“独抒性灵”“信口信腕”，无拘无束，在精神上与周作人的主张是一致的。而周作人是反对模仿的，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这自有其合理性，并非故意唱反调。至于在思想上他是承认外国影响的，认为新文学的萌芽是从外国来的。有一段话很可以表明他这种观点：“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